

李文海◎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史并不遥远

K250.7/38



历史并不遥远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67262

李文海◎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并不遥远 / 李文海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5683-0 / K·266

I. 历...

II. 李...

III. 中国 - 近代史 - 文集

IV. 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112 号

历史并不遥远

李文海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150×230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2.7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9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个别篇目外，大抵是在1996年至2003年上半年间写成的。根据文章的内容，我把它们分为四组。一组是讲晚清社会变革的，共17篇，这是本书的主体。另一组是对近代灾荒的研究，共5篇，其中一篇涉及的时间超出了近代，但对近代的灾荒也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也放在一起。还有一组是讨论历史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的，共8篇，虽然谈的不是具体学术问题，但这些问题对历史学的发展，显然带有更加根本的性质。最后一组是讲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共6篇。我们的伟大民族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涵养而成，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新时期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正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对这个问题作一点呐喊呼号，实在是尽了一点史学工作者的本分。

在这些文章中，有几篇是我和其他同志合作撰写

的，都在文中一一作了说明。趁这个机会，我要再一次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过，在看完了全书的目录之后，却发现，这些文章，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

先说缺点。那就是这些文章，涉及的方面和范围较泛、较杂，经过自己有计划、长期积累和潜心钻研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内容也就较浅，缺乏深度。产生这一缺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章的写作，多半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为完成某种任务而写的。套用鲁迅“遵命文学”的说法，东施效颦一下，也可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奉命史学”。当然我决不敢随便去攀附鲁迅，鲁迅自己说他“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①，而我所“奉”之“命”，其实十分具体，十分简单，无非是工作的需要、报刊的邀约、朋友的嘱托，有时还有学生的要求等等而已。不过应该申明一点，所谓“奉命”也者，只是讲文章写作的缘由，也就是“为什么写”，至于“怎样写”、“写什么”，倒是完全自由的，并没有任何方面作过任何的规定和限制。因此，不管对了也好，错了也好，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应该文责自负。

既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那么反过来说，“有一弊”往往也会“有一利”。所以同缺点相伴的，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这些文章，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比较紧密，有较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有些文章是直接针对现实问题而写的；有的文章虽然讲的是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但心目中也往往存在着某种现实针对性，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种做法是不是历史学发展的正确途径，大家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有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认为史学文章，只有离现实愈远，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愈高，才能传之久远。不过我倒是赞成梁启超的主张的，他在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讲演中说：“现代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②

本书的书名，是从黄兴涛同志所写评介我的学术道路的文章题目借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② 《历史研究法》，第一讲，载《清华周刊》（384）。

用来的。就我来说,“历史并不遥远”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时光的流逝实在太快(这种感觉似乎愈上了年纪就愈加强烈),刚刚经历不久的事情,一转眼间,就变成历史了。且不说建国初期,自己稍稍懂事时亲历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这些事,早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就是好像就在昨天的“文革”岁月,同现在的研究生们讲起来,听的人似乎也隔膜得很,而讲的人也颇有点“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从这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另外一层意思,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些历史规律、有一些历史经验、有一些历史真理,仍然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贴近,至今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有时读历史资料,会无端地感觉到,某些今天仍然引起人们困惑或者争论的问题,其实早在多少年以前就由我们的先哲们思考过、议论过甚至解决了。历史并不只是人类的尘封的记忆,它生动地记录了过去,却同时以坚实的脚步与今天同行。

任何一个时代,对先于这个时代的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总是不完善的,无法穷尽的,总是要受到时代的局限。当然更不用说每个单个的个人(即使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了。但是,这并不会减弱历史的无可抗拒的魅力。重要的是要有浓厚的、强烈的历史感,当然,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有人主张,“要多一些历史感,少一点历史观”。这种把历史感同历史观对立起来的看法,我以为是不妥的。任何人对历史的观察、认识、诠释,必定由某种历史观所支配,不是这一种历史观,就是另外的某种历史观;历史观没有多少之分,只有对错之别。“少一点历史观”,不但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周恩来曾经把历史称作“民族的记忆”,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①真是凑巧。与周恩来一起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伟大事件中做出历史贡献的基辛格,对历史的看法几乎同周恩来一模一样。他在《重建的世界》中强调“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他说:“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个仅

^① 《北京日报》,1996-04-06。

有的经验，也是他们惟一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真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要记住：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文海

于人民大学林园

2003年7月24日初稿，9月1日修改

目 录

晚清社会变革

- 告别 20 世纪的历史思考 / 3
-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10
- 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 / 17
- 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 / 28
-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 45
- 戊戌百年祭 / 53
- 晚清爱国思潮的折射与映现 / 59
-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及其局限 / 65
- 义和团与封建统治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 / 70
- 荣禄与义和团运动 / 93
- 八国联军侵华百周年断想 / 120

中国这样走进 20 世纪

——义和团运动后的中国政局 / 126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献身精神 / 137

民主革命的重要里程碑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 / 141

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 / 145

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研究述评 / 160

走向新中国之路 / 175

近代灾荒研究

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 / 187

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 / 191

鸦片战争时期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 / 222

灾年谈往 / 232

《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 / 240

加强学科建设

就史学社会功能答客问 / 253

关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 259

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 / 266

打破分割 促进融合

——对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 / 271

论晚清史研究 / 276

我们今天要纂修一部什么样的清史 / 284

《走向共和》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

“新的历史观点”? / 298

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在“2000年著名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 305

弘扬民族精神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 / 315
黄土文明的过去和未来 / 319
民族精神：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 327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333
爱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 340
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 / 345

晚清社会变革

历史并不遥远

WANQINGSHEHUIBIANGE

告别 20 世纪的历史思考^{*}

20 世纪即将过去，21 世纪马上就要到来。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们不妨对刚刚走过的 20 世纪做一点历史的思考。

(一)

在我们告别 20 世纪的时候，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和命运作着种种分析和预测。意见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但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地集中。至少，国内绝大多数的人们，关心和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世纪，我们怎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是，在 19 世纪末叶，面对着即将来临的 20 世纪，人们关心和考虑最多的，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会不会

^{*} 本文最初发表于 2000 年 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所以文章开头有“20 世纪即将过去，21 世纪马上就要到来”的话。2001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作了转载。

随着 19 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还能不能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忧心忡忡，当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确切反映。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这一段话，就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腴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换。呜呼！望中国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①

从争取生存到致力腾飞，在人们所关心问题的强烈反差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年间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变化的深刻程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看一看 20 世纪开始时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再看一看 20 世纪终结时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两相比较，自然可以对 20 世纪的历史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观察历史应该采取的起码的科学态度。

（二）

这一百年间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当历史刚刚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讨论中国怎样才能立足于新的世纪时，说了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羈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452 页。

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军》）

这一段话，在那些主张“告别革命”的人看来，当然是一种宣传“革命崇拜症”的典型文字。且不管我们对邹容的这段话抱什么样的看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类似这样的呼喊，并不只是孤立地出自邹容之口，而是代表了20世纪之初一代社会精英的共同心声，同时还在更大范围里震撼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灵魂。只有革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对国家命运做出的明确回答。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

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黑白分明，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赞成、歌颂也好，反对、指斥也罢，无论如何，革命确实确实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为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至少，20世纪的上半叶，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内容。如果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那么，革命对于20世纪历史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

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错还是对，容易陷入概念的争论，也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不论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还是

稍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外反动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得不用暴力去推翻这样的反动统治，以清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的部分——政权，虽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重大反作用。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便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定要防止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我觉得，在非难革命的问题上，如果不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是从学理的角度来讨论，则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的。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没有适宜的客观环境，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甚至会发生凋敝破坏。这一点，同样由一部中国近代史做出了生动的证明。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是在革命之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所以，把革命只看做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对经济发展的中断，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它的片面性就在于没有把革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去分析。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